



话语权力再生产

——《红岩》的成型过程及改编研究

Reproduction of Discourse-power

The Research on *Red Crag*'s Formation and Adaptation

陈由歆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话语权力再生产

——《红岩》的成型过程及改编研究

陈由歆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语权力再生产：《红岩》的成型过程及改编研究/
陈由歆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610-6320-0

I. ①话… II. ①陈… III. ①红岩—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1446 号

出 版 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印 刷 者：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148mm×210mm

印 张：7.125

字 数：200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董晋骞

封面设计：曹 军 徐澄玥

责任校对：合 力

书 号：ISBN 978-7-5610-6320-0

定 价：18.00 元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邮购热线：024—86830665

网 址：<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

序：经典的“重述”（代前言）

——一种文本现象和进入“十七年” 文学的研究思路

孙先科

“重述”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技巧，它复述早期的某个传统典型或者是故事、主题，其中暗含着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变更等，从而使新文本区别于原文本而成为独立的创作。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这一定义的表面陈述，而是注重其实质，任何试图通过改变原文本的基本状貌，从而达成新的意义生产的表述，都可以被看做“重述”这一文本现象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对传统典型、故事、主题进行复述，进而修改原文本意图的“重述”现象，远不如版本修改、对故事进行续写以及借助其他文体进行改编等方式更为普遍、更为频繁。或许可以说，版本修改、续写、改编已经替代对传统典型、故事、主题的改写而成为“重述”这一文本现象的主要方式，甚至可以将它称之为一种新的文本现象。

就形态学与美学特征而言，长篇小说具有更大的敞开性、未完结性，具有更大的修改、续写的必要和可能。由于“十七年”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小说”承载着将革命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历史使命，而事实上这些作品的确在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道德观等方面满足了政治与历史主体对历史的想象和对现实秩序所做的辩护。为了使意识形态的宣传效应最大化，通过对这些作品

改写、改编等二度创作，使其普及化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是当代文化创作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艺现象。长篇小说的改编十分普遍而且形式多样，主要类型有：话剧与戏曲改编、影视改编、评书、快书、广播连载等曲艺改编、连环画改编等。这些改编除了本书所谈的《红岩》，更是涉及了《林海雪原》、《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等所有的著名长篇小说。

在“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研究成果上，从版本、改编的角度展开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是，将修改、续写、改编归理为“重述”，将它放置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艺生产、再生产的运动机制中，既做出文献学的整理，又对这一现象做意义解读和历史阐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年”经典文本承担着意识形态传播的巨大职责，要将这种传播普及化，使之更为深入人心，将这些经典文本“改写”为舞台形象和影像语言就成为重要的途径。以庆祝建国十周年为契机，在此前后，形成了对这些经典长篇小说改编的第一次高潮，当时最主要的是电影改编。另一次，改编热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而且是以普及到千家万户的电视为载体，以电视剧为其主要的文类样式。由于90年代的现实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些经典文本的改编普遍被加入了情欲化的因素，对原文本的场景、故事因素、氛围、情调、精神进行了解构性的戏说。影视剧的“改编”遂成为被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这些经典文本改编的研究只零星地见于报刊，多在影视作品放映并引起一定反响之后，研究的思路多集中于对改编得失的品评，很少有研究者将改编本与原文本做仔细的比对，探讨新文本与原文本相比做了哪些取舍，取舍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

借用黄子平对“十七年”的经典长篇所下的评语——它们对

“革命”的叙述承担的是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而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批长篇小说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以“讲话”确立的文学范式讲述“革命历史”的方式与过程，也是一个尝试树立当代文学经典的过程。由于作家的成长经验、所接受的文化与文学资源不同，这些长篇小说最初的版本中程度不一地存在不同话语、不同文化的并置、对话，甚至是冲突。来自官方、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的批评声音给作家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和压力，因而通过“修改”、“续写”原文本来“矫正”“失误”，是作家躲避政治责难，使作品“正典化”的途径。发生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修改、续写与改编，不同的文本存在不同的状况，但大体的取向是一致的，一是加强阶级分析的观念，二是去除与身体、欲望、爱情有关的描写。由此看出，“文革”以前，这些长篇小说的“重述”实现的是“经典化”的过程，其目标是主题的政治化、神圣化与叙事话语的纯洁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是倾向于大众文化改编的高峰期，而且改写的比重很大，大量的欲望化的因素被植入改编过的新文本，呈现出革命话语、启蒙话语、身体欲望等错综纠缠的新景观。“重要的不是神话书写的年代，而是书写神话的年代”，对这些经典文本的每一次“重述”，都是一次新的书写，都深深地留下了“书写年代”的痕迹。寻找这些痕迹，并挖掘出这些“痕迹”背后的精神矿藏应该是文学研究中一个有趣、也有意义的思路。将“十七年”经典文本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被“重述”的现象，看作经典被接受的旅行过程，经典被改动（选择/遗漏的机率）的痕迹，透露出的是不同思想、不通话语摩擦互动的征候，通过描绘关于这些经典文本一流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图景，实际上也描绘出思想、文化、精神在当代旅行的动态的历史。这正是勃兰兑斯要实现的“最深刻意义上的文学史”：“是一种心理学，研

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总之，以“重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作为进入文学历史现场的突破口，从而构筑一个将文本细读、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文学语境的还原有机结合起来的、立体的历史阐释结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完成对当代话语关系史、思想史、文化史、灵魂史的描述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

★该序言为本书作者的博士生导师、河南师范大学孙先科教授所写，原发表于《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2期）。

前 言

一、问题的提出

《红岩》在问世一年后即突破 800 万的发行量，被称作“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共产主义教科书”。根据小说母本改编的舞台剧出现后也引起了很大反响：1962 年 8 月，青岛话剧团、四川话剧团、北京人艺等相继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同时还有京剧、沪剧、婺剧、越剧等地方戏和曲艺改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1964 年拍摄完毕。1964 年 10 月，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在全国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连续公演 256 场。1967 年 4 月，由汪曾祺、阎肃根据《红岩》改编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彩排成功（未公演）。

《红岩》自 1962 年到 2004 年已经有 3 个版本和一个农村版，重印 59 次。目前销售总量已经超过 1200 万册。它的改编文本和衍生读物种类、数量也很庞大。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顺应“群众化”、“革命化”、“民族化”的文艺方针，出版了大量根据《红岩》改编的通俗唱本和曲艺文本。新时期以来，“红岩”读物仍重在教育功用，人物传记占较大比重。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文化消费市场以读者阅读需求为导向，出版的多是以揭秘史实真相为目的的消遣性读物，如《红岩档案揭秘》、《血手染红岩——徐远举审讯实录》等。

大众文化时代电视和网络成为主要传媒力量，也是新兴的受众面最为广泛的意识形态载体。1985 年和 1999 年《红岩》被两次改编成电视剧，2003 年拍摄了根据小说改编的黄梅戏《彩霞

满天》(7集电视连续剧),它们都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曲艺家袁阔成、李鑫泉、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岩魂》、《红岩》、《双枪老太婆》不仅被制成了DVD销售发行,还有网站可供免费收听。重庆市委和红岩魂纪念馆制作的专门网站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2004年下半年为教育青少年,重庆市委投资研发了“小萝卜的故事”电子游戏软件,引发了革命经典能否游戏化的争议。

舞台剧《红岩》的改编在21世纪前后呈现出新的面貌,审美效果、表现手法、唱腔技巧都为迎合观众审美心理做了很大突破,值得一提的是空政部歌舞团演出的大型现代舞剧《红梅赞》(2001年),中国京剧院排演的现代京剧《江姐》(2001年)(在2002年由张元导演拍成戏剧电影)。天津京剧团排演的《华子良》(2003年)、中国评剧团排演的《红岩诗魂》、浙江越剧团排演的《红色浪漫》(2007年),它们不仅受到观众好评也成为国家“主旋律”的代表剧目。

从传播效应和话语模式之间的关系角度,可将《红岩》成书至今的传播历程分成两大阶段:上半阶段是革命话语传播兴盛期(1950—1966),《红岩》从酝酿写作、出版宣传、评论直至被推上“共产主义教科书”的位置无一不带有深刻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烙印。1963年以后,其他艺术形式开始对其加以改编,虽然有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汇入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群众的审美需求,但总体上不能改变其政治文本性质。下半阶段,革命话语衰退期或者叫大众文化审美兴盛期(1985到目前),这一时期伴随电视、网络等媒介技术进步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牺牲”、“共产主义信念”、“阶级斗争”等依附在单一意识形态语境的“革命”话语的历史存在感日渐模糊,在20世纪60年代无法进入叙事的“日常生活”、“个体私语”等在新近出版的衍生文本和新改编的文艺样式中逐一出现,革命性已退居次要地位。

孟悦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中说:“延安时期的文学常常不言而喻地被看做纯粹的政治

运作的产物，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学多少被视为某种政治表态，于是不大有人对其更复杂的内容做学术研究。”^①“共产主义教科书”这种政治/文学一体化范式时期对文本的评价，并不能涵盖《红岩》历时性文学价值，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开放性文本可以不断被生产”，^②即使在国家意识形态为主流话语的十七年时期，它的改编也存着裂隙，隐含着“一体化”下国家权力、民间意识、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等多种话语机制，它提供了各种文化力量之间交流和角力的平台，所隐含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文本的单纯审美意义。

二、《红岩》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的研究情况

《红岩》自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发行后，立刻成为评论焦点。较早从学术视角批评阐释《红岩》的主要有1962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的《五人谈〈红岩〉》、罗荪、晓立在1962年第3期《文学评论》发表的《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朱寨在1963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读〈红岩〉》、阎纲所著的《悲壮的〈红岩〉》，以上文章多采用“真实”、“典型”、“革命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等十七年时期批评范式标准，所作的评价集中于小说思想主题。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读者评论文章。在1963年《全国总书目》^③报刊图书评介索引“红岩”词目下可以查到仅1962年一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四川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刊登《红岩》相关评论文章共计147篇。重要的有《共产党人

①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② 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

③ 《全国总书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713—718页。

的“正气歌”——长篇小说《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①、《〈红岩〉的写作和特色》^②、《疾风知劲草——读〈红岩〉中的许云峰》^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④收录的1963年、1964年和到1966年的评论文章分别为13篇、4篇和1篇。《红岩》在“文革”时期被批为“给叛徒作传”，只有反面批评的文章，1977年马识途撰写的《红岩挺立在人间——祝小说〈红岩〉再版》^⑤标志着它又重新回到阅读和评论视野。

与出版伊始的“红岩热”截然相反，1977年到1983年初只有26篇报刊评论文章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收录，特别是在1990年以前，《红岩》和其他革命历史小说被读者冷落，《红岩》在专业学术范畴成了一个空白。1981年到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当代文学研究篇目”中关于《红岩》的论文只有一篇。^⑥在1988年“重写文学史”口号下，十七年时期曾经受批判和冷落的知识分子隐形写作得到了学术界高度重视，研究者带着极大兴趣挖掘其中潜藏的文本间性和“话语裂隙”。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学术界对十七年文学“再解读”产生极大兴趣，研究者们尝试从不同角度对革命历史小说进行文本内外的探索，但是针对《红岩》个案的研究不是很多。中国知网期刊类收录的1983年到1999年间，评论文章中仍旧以审美评价居

① 阎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长篇小说〈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人民日报》1962年3月2日。

② 王维玲：《〈红岩〉的写作和特色》，《光明日报》1962年3月24、27日。

③ 潘旭澜：《疾风知劲草——读〈红岩〉中的许云峰》，《解放日报》1962年6月4日。

④ 牛运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45—557页。

⑤ 马识途：《红岩挺立在人间——祝小说〈红岩〉再版》，《北京文艺》1977年11期。

⑥ 刘剑锋：《〈红岩〉的思想和艺术》，《枣庄师范学报》1984年第1期。

多,比如《一曲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赞歌——〈红岩〉的艺术视界》^①、《〈红岩〉英雄群体的共性美和个性美》^②。但在20世纪90代末期也出现了少数的深入解读方式,比如《规范与冲突——读解〈红岩〉》^③就是本人读到的较早运用“身份认同”和“个体话语”的理论来分析知识分子形象的文章。

在其后的“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中《红岩》也没有引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电视剧褒贬不一的争论,主要因为《红岩》是革命话语书写的理念型的文本,它不能为大众话语重构提供扩充情节的空间,而且它在十七年文学史的特殊地位也得到来自国家文化管理机构的维护。综上所述,《红岩》文本内部研究到20世纪末并不是学术关注的热点。

(二) 21世纪以来与《红岩》个案相关的研究成果

从不同角度可将最近十年对《红岩》的研究分为以下几大类:

1. 现代性的研究。革命历史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是近几年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性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正式提出以来就出现了多重阐释。蓝爱国的《解读十七年》,从“现代性”、“日常生活”、“物质话语”三个理论基点建构文本个案与宏观文学史的观照。《地下的人们——重读〈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文中,他认为《红岩》提出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态度怎样凸现革命性的问题”,小说中“革命意志来源于革命者面对日常生活的寡欲”,英雄人物形象具有非个性化祛世俗化的特征。^④李扬在《〈红岩〉——红色圣经中的现代性革命》中认为解读要建立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我将《红岩》视为一部现代性的教科书,这部浓缩了20

① 王科:《一曲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赞歌——〈红岩〉的艺术视界》,《渤海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② 张伟:《〈红岩〉英雄群体的共性美和个性美》,《语文学刊》1987年第4期。

③ 石恢:《规范与冲突——读解〈红岩〉》,《创作评谈》1999年第6期。

④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

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烈的现代性冲突的‘红色圣经’在展示出‘家庭’、‘个人’、‘身体’这些范畴在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意义的同时，更表达了由施虐与受虐构成的现代性激情。”^①他用“虐恋亚文化理论”证明《红岩》宣扬了“20世纪中国人独有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与以前评论中只突出阶级论政治视角相反，李扬消弭革命抽象思维的同时也在积极建构另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但是这个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这是一次西方“力比多”心理学理论操作而没有“身临其境”地考虑十七年文本产生的语境特征。

2. 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的研究。这种研究恰好弥补了现代性解读薄弱之处，它关注社会客观原因对文本生成机制的影响。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设《〈红岩〉的写作方式》一节，认为《红岩》成书过程是一次成功的“为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组成的写作协作”。他在专著《问题与方法》^②中进一步阐释“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的层面。”中国人大钱振文的博士论文《〈红岩〉与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通过详细梳理《红岩》组织生产的整个过程及细节甄别，呈现出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学文本成型和传播的复杂性。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书中虽然没有把《红岩》作为具体考察对象，但是书中用作家论、读者论以及传播学、出版学的交叉学科理论展开对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全面研究，详细论述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群众读者、文学批评、文学政策等多个层面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拓展了《红岩》及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视角。

^① 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②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叙事学的研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叙事学的研究不再限于叙事语法、叙事结构等静态研究,而是将叙事学置于文化背景中,做更广泛的研究。程光炜在《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红岩〉的创作策略》一文中,从叙事习惯的排斥性和叙述态度的暧昧性入手,通过分析“叙事规则”的确立过程、叙事倾向和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论证了“三红”文本是文学叙事与政治期待的结合,是新中国权力机构鼓励的一次“红色讲述”。钱振文的博士论文《〈红岩〉与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综合大量史料实证,认为“革命文学建立革命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表征手段是对革命的颠覆性异己因素——敌人的设置”,这个“设置”决定了某个阶段的某个“合理”叙述到了另一个时间段就可能变成很不合适甚至“反动”的叙述,这就需要对叙事策略进行不断地调整。

4. 传播现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论文《试论〈红岩〉文本的传播效果》、《经典文本的变迁和历时传播——以〈红岩〉为例》两篇文章中,作者田义贵认为对于《红岩》这个历时性特征比较明显的传播研究对象,必须为之建立一个“历时传播研究模式”,重点研究其传播过程中的变迁,发现其传播规律。他用子弹理论/强大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和适度效果模式分析原文本及其衍生文本传播效度,加宽了《红岩》研究方法的交叉领域。此外樊星主编的《永远的红色经典——红色经典》^①用专门一章勾勒了《红岩》从 20 世纪 60 年代成型到 21 世纪改编的全过程,但该书重在史料罗列,没有进行理论阐释,语言也是陈述性而非学理性。孟悦的《〈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②和戴锦华的《〈青春之

① 樊星主编:《永远的红色经典——红色经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年。

②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歌》——历史视阈中的重读》^①对原作的改编文本进行了深度话语分析，这是非常有益的解读方法。

5. 文化研究：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来，国内的文化研究逐渐升温，通过这一跨学科、并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理论方法，可以获得相对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帮助我们纵向观察政治/文学一体化时期到大众文化时代，文本内部话语机制的嬗变及其勾连的社会文化现象。但目前尚未展开针对《红岩》个案的文化视角研究，可以提供借鉴思路的包括陶东风的《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②、黄叔泉的《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③、傅泽的《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市场逻辑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研究》^④。他们从各自角度论述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大众以及民间等话语机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复杂关系。

《“红色经典”界说、改编及传播》^⑤也对各种话语权力之间的文化关系做了细致考量，该文作者认为红色经典诞生之后，诸多艺术样式都在这里寻找资源，但必须事先厘清“经典”（话语机制）和文化的关系，否则可能打破权力生态之间的平衡。此外参考价值较大的还有戴锦华的专著《隐形书写》，该书全面总结了大众文化语境下现实与话语逻辑，分析了“怀旧”、“记忆”、“禁忌”等情结对文化消费的刺激作用。

①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 陶东风：《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 黄叔泉：《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④ 傅泽：《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市场逻辑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 侯洪，张斌：《“红色经典”界说、改编及传播》，《当代文坛》2004年第6期。

三、本课题相关概念

(一) 生产

课题中作为概念的话语权力的“生产”属于文化生产范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关注文艺作品成型的物质条件。在继本雅明等人之后，特里·伊格尔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理论，他说“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并且认为“文学价值是用对文本的思想见解，用作品的‘消费性生产’，亦即解读行为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现象。……我们却必须把这种实践作为文本确实在进行的（再）生产来研究”^①。他站在意识形态批评角度上，试图消除传统内部研究——话语与外部研究——生产过程的分野。文学生产必定和话语表述有关，所以话语权力也可以在意识形态允许的前提下被生产出来，成为一种社会化、组织化和商品化的活动。用物质生产来对应话语生产目的就在于将这个过程置于组织结构、生产制度、传播和消费各个具体环节进行研究，重点是不同语境下话语权力分配比例大小和他们运作的细节。所谓的“再生产”就是将话语权力运作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

(二) 话语权力

“话语—权力”在福柯的《话语的秩序》和《权力/知识》等著作中是两个重要的相关概念，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权力无所不在，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权力产生于话语机制，它在话语的运行中运作，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话语本身常常转化为权力，同时，话语又是权力所争夺的对象。福柯认为特定的话语主体按照各自的知识模式行使话语权力，赋予事物以秩序和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进入特定序列的权力，但是要获得其他行为主体身份下的权力，就必须受

^① [英]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审美价值》，见陆梅林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705页。

这种话语的控制，权力和话语就是这样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权力把不同的话语形式联成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就有了不同的话语力量。^①

与此类似的是布迪厄说提出的“表征权”概念，表征权是一种主观维度的符号（感知图式）斗争：“在对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种种斗争中，关键的是对于分类图式和系统的权力，他们乃是对于群体的表征的基础，因而也是动员或分化（demobilization）的基础。”^② 不论是福柯说的话语权力还是布迪厄采用的表征权概念，其核心论点是话语或感知符号在表述现实的同时也建构了现实，即文本可以生成意识形态。话语或符号的权力是非暴力的，它自身是统治者实施统治行为的同谋。

李杨在研究 1942 年到 1976 年当代中国的叙事文学时，把“叙事”理解为“话语”。他指出：“当我们把叙事理解为‘话语’的时候，叙事就不仅仅是一种文体风格，而且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话语是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概念，任何话语都有它的权力基础。”^③ 他认为叙事之所以是一种“话语”，正在于叙事指向着某种实践，体现着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文体风格”，李杨在这里表现出融合政治、历史与文学的倾向即把它们都视为话语实践的产物，这对理解小说《红岩》的写作很有帮助。本论题中的“改编”就是不同的话语主体在各自文化立场上对文本进行重新叙事的行为，表现他们特定认知方式和价值观。

（三）《红岩》生产和改编中的四种主要话语权力

1.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红岩》文本和改编文本的话语网络中有四种权力形式，即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知识分子话语权力、民间话语权力、大众（通俗文化消费性质，而非大

① 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年，第 151—152 页。

②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p479, 转自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年，第 108 页。

③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年，第 9 页。